

世界文明大系

世界文明大系

总主编 汝信

儒家文明

CONFUCIANIST
CIVILIZATION

马振铎 徐远和 郑家栋 著



世界文明大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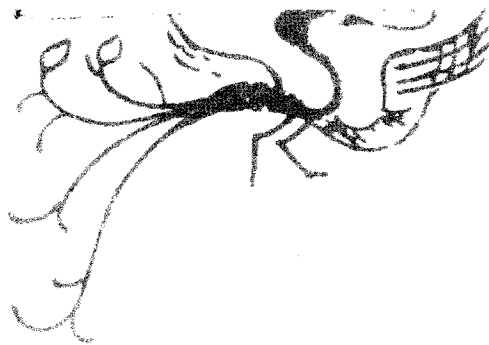
95.01/10.2 总主编 汝信

儒家文明

CONFUCIANIST CIVILIZATION

马振铎 徐远和 郑家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文明/马振铎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9
(2000.5 重印)
(世界文明大系)
ISBN 7-5004-2408-6

I. 儒… II. 马… III. 儒家-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9430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100720)
1201 印刷厂印刷装订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25 插页:6
字数:318 千字 印数:4001—7000 册
定价:25.00 元

总 序

PG07/08

汝 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和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较全面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地应

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研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civis*，而 *civis* 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但这个术语到 18 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 20 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也不

能同意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来的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亨廷顿的理论以文明作为未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显然有所忽视，即使在谈到文明时，亨廷顿也过多地重视其“冲突”的一面，而对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的倾向注意不够。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恰恰相反，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象和主流。在世界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变革时代，我们更应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彼此取长补短，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鉴于以上考虑，本课题组把世界文明分成以下这些专题进行研究，即：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二、印度文明；三、伊斯兰文明；四、儒家文明；五、犹太文明；六、西欧文明；七、斯拉夫文明；八、非洲黑人文明；九、日本文明；十、美国文明；十一、拉丁美洲文明。应该说明，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且并未把世界文明包举无遗，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只是打算从探讨以上这些主要的文明入手，求得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宏观的了解。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基金的资助，全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特此志谢。

有关世界文明的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本书中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尚希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前 言

这本书是汝信、陈筠泉、陈启能、倪培耕四位教授主编的《世界文明》丛书的一种。在书中，作者比较系统地向读者介绍世界文明中一种重要的文明形态——儒家文明。

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先向读者交代一下作者对几个与本书撰写有关的问题的看法。

本书在编写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清“儒家文明”与“中国文明”（或“中华文明”）的关系。如果二者关系不清，有可能把儒家文明写成中国文明。作者认为，儒家文明是中国文明发展到成熟时的产物，在儒家文明诞生前，中国文明已走过很长的一段路途。

那么中国文明始于何时？儒家文明又始于何时？

通常的看法是：当黄河流域各部族结成关系比较紧密的大联盟和黄帝成为大联盟的首领时，中国就步入文明时代了。

人们之所以把黄帝成为黄河流域各部族共主作为中国文明开端的标志，不仅是由于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即从黄帝写起，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黄帝时代有了一系列重大的发明创造；同时为了维系部族大联盟，中国先民建立了超越原来氏族血缘伦理的社会制度。这两点是可以作为文明开端的普遍标志的。正因为

如此，黄帝被后世尊奉为“人文始祖”。从黄帝算起，中国文明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步入文明时代的国家之一。

儒家文明则是中国文明发展到产生出众多的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并且其中一个学派——儒家的学说成为中国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思想时才诞生的。儒家文明诞生的标志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这时算起，儒家文明迄今不过是两千余年的历史。

儒家文明是自黄帝以来中国文明发展的延续，但又与中国早期文明有所不同。中国早期文明是中国先民的自发创造：无论是尧“象以典刑”，还是舜设置“平水土”的司空、主管农业的后稷等官职和机构，抑或是周公的“制礼作乐”，都不是在某种观念体系指导下作出的。儒家文明则不然，它是在中国哲学已经产生，并且其中的儒家思想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接受成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情况下诞生的。从西汉中期开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文明创造者们思想和实践活动的固定的“格”，他们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儒家学说的指导和制约，他们的创造物即中国文明也因此打上了“儒家”的鲜明烙印。

— —

我们说儒家文明是中国文明发展到西汉中期才诞生的，这是否意味儒家文明等于西汉中期以后的中国文明？这一问题是儒家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关系的另一方面。

我们的回答是：儒家文明不等于西汉中期以后的中国文明。从地域上说，儒家文明不是西汉中期以后中国文明的全部，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广大地区，受佛教、伊斯兰教的影响是主要的，不能将其简单地划入儒家文明范围；同时，西汉中期以后的中国

文明也不是儒家文明的全部，中国的近邻——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文明也属于儒家文明。

儒家文明与中国文明地理上的错位，是儒家文明向西扩展不如向东扩展顺利造成的。

中国西部广大地区，多为高山峻岭，荒原大漠，交通极为不便，儒家文明向西扩展因此受到一定限制。此外，中国西部地区距离儒家文明中心区域，同距离佛教文明地区、伊斯兰教文明地区远近差不多，因此这一地区是多种文明相互撞击和融合的地区。当中国国力强大、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控制有力时，例如汉、唐两大王朝期间，这一地区接受的影响以儒家文明为主。《汉书·西域传》载，宣帝朝，龟兹国国王及夫人，“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这段记载即反映了中国新疆地区在汉、唐时接受的影响主要来自儒家文明。但是在国力孱弱的宋、明朝代，儒家文明的影响也相应削弱，其他文明便乘虚而入，将这一地区纳入自己的范围。

与上述情况相反，儒家文明向中国东邻的扩展要顺利得多：中国与朝鲜、日本、越南之间没有多少交通障碍，这些国家的周围也没有能够与儒家文明分庭抗礼的其他文明。在儒家文明几乎不间断的影响下，这些邻国的原有文明也“儒家化”了，它们与中国共同组成东亚儒家文明圈。

儒家文明与中国文明在地域上的错位，表明二者是不等同的。儒家文明是以中国为发祥地，以中国东部为中心、其地域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区域性文明；中国文明则是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多元文明。作者以为，这样概括儒家文明和中国文明才比较准确。

儒家文明虽然不等于中国文明，但毫无疑问，中国（东部）文明是最典型的儒家文明。因此本书内容只限于中国，不涉及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文明，以免枝节繁杂。



儒家文明的诞生，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不再发挥任何作用。事实上儒家文明诞生后，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对中国文明发展的影响始终存在。

我们只要看看董仲舒要求汉武帝独尊的“儒术”究竟是什么就会明白这一点。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在儒家经历了战国、秦、西汉前期，已充分吸收了先秦其他学派的思想之后提出的。因此董仲舒所谓的“儒术”，实乃吸收了先秦诸子思想精华的儒术。就以董仲舒本人的“天道之三纲”来说，其中的“天”是有意志的，明显地带有墨家“天志说”的痕迹；“三纲”最直接的来源是韩非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此天下之常道也”^①。而用以论证“三纲”合理的则是阴阳家的思想。

如果说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时的“儒术”已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诸子集成”，那么“罢黜百家”实行的结果是使其他学派的思想进一步渗入儒家思想：罢黜百家的实行，使原先治黄老、申韩、纵横之术的人断绝了登上仕途之路，他们不得不改学儒家学说。但是他们原先所学的黄老、申韩、纵横之术仍作为“先入之见”存在于他们头脑中。他们带着这样的“先入之见”去改学儒家学说，不可避免地要把其他学派的思想带入儒家学说之中。因此，当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指导思想时，被融合在儒家体系中并作为其成分的其他学派的思想，其实也在暗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儒家文明诞生后始传入中国的佛教和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则公开地对中国文明发展施加影响。就总体而言，它们对西汉中期以

^① 《韩非子·忠孝》。

后中国文明发展的影响远不及儒家思想，但是对于某些部门，例如艺术中的雕塑、科技中的化学，其影响却超过了儒家。

在儒家文明发展中，除了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外，还有其他思想影响存在，是儒家文明之所以绚丽多彩、果实丰硕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上述观点，本书在强调儒家思想对西汉中期以后中国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的同时，对其他学派思想以及佛、道二教的影响也给予充分的重视。

四

每一种文明都是历史的产物。像一切在历史中产生的事物终归也要在历史中走向衰亡一样，每一种文明也都是有兴有衰的。儒家文明亦如此。盛唐是儒家文明发展的巅峰，此后它便走上下坡路，虽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在世界上仍保持领先地位，但是明显地丧失了原来的阳刚之气和进取精神。14世纪，儒家文明开始失去它在世界上的先进地位。迄至19世纪中叶，儒家文明已远远落后于新兴的西方近代文明，并在二者冲突中屡遭惨败。

儒家文明的衰落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一连串失败，不是儒家文明衰落的因，而是它的果。但是中国的失败也把儒家文明难以同西方近代文明抗衡的老态龙钟暴露出来，从而加速了它走向衰亡的步伐。

从鸦片战争失败开始，中国人就对其引以自豪的儒家文明重新进行估量。最初他们发现它有某些“不足”，因此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到了本世纪初，人们已认识到它不是“不足”，而是“不行”了，对它仅修修补补已无济于事。辛亥革命前发表于《越报》、《河南》、《新世纪》等报刊上的《名说》、《无圣篇》、《排孔征言》等文章即反映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当一种文明被其创造者

认为“不行”了的时候，它也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本世纪初儒家文明的境况正是如此。最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给了处于苟延残喘中的儒家文明致命一击，从而结束了中国文明发展史上这漫长的一个阶段。

儒家文明的终结，不是中国文明的终结，而是中国文明的新生。“五四”前后的文化运动之所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就在于它把中国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用以为中国文明这一新阶段奠基的是科学和民主，而儒家文明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成果，将作为一笔丰厚的遗产，被中国新的文明批判地继承下来。

说到中国文明的新生时，有必要谈一下“现代新儒家”和“儒学复兴”问题。所谓“现代新儒家”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一个哲学学派，其宗旨是保存、延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统。这一学派在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学派，六七十年代在港、台和海外十分活跃，8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也有相当影响。在它的推动下，儒家学说大有复兴的趋势，这也就是所谓的“儒学复兴”。

但是儒学复兴不等于儒家文明的复兴。儒家文明的诞生是以儒学被定于一尊为前提的，儒家文明的复兴也当以儒学重新被定于一尊为前提。而今天儒家思想重新被定于一尊已无必要，也无可能。

本书由马振铎任主编。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共十八章。其中前言、第一至八章和第十三章，作者为马振铎；第九至十二章和第十四章，作者为徐远和；第十五至十七章和结语，作者为郑家栋。他们都是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初涉文明史研究领域，论述中难免出现舛错，敬请读者赐教。



1 西安半坡出土的粟粒和储粟陶罐



2 陕西黄陵县轩辕庙碑石



3 刻有文字的龟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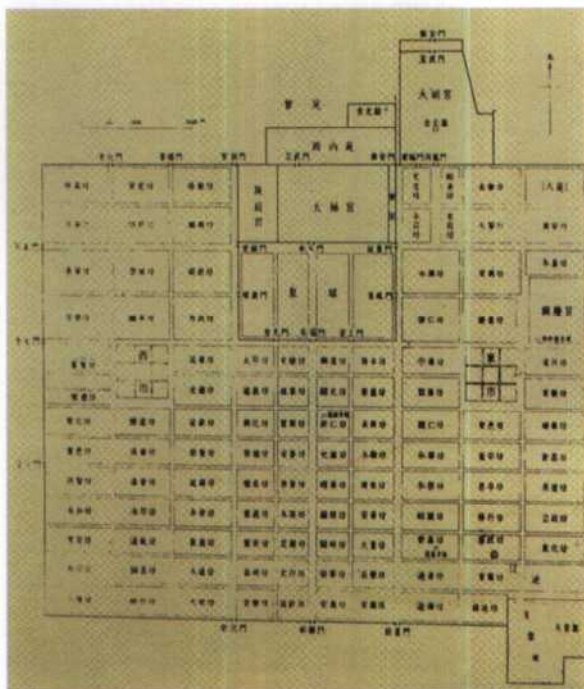
4 西汉铁钁及僻土。1967年陕西咸阳窑店出土



5 毕昇像



6 西汉时纸张。1978年陕西扶风县出土



7 唐长安城平面图



8 北京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中国最高学府

先師孔子行教像



9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奠基人



10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儒家代表